

新时期小说 人性发掘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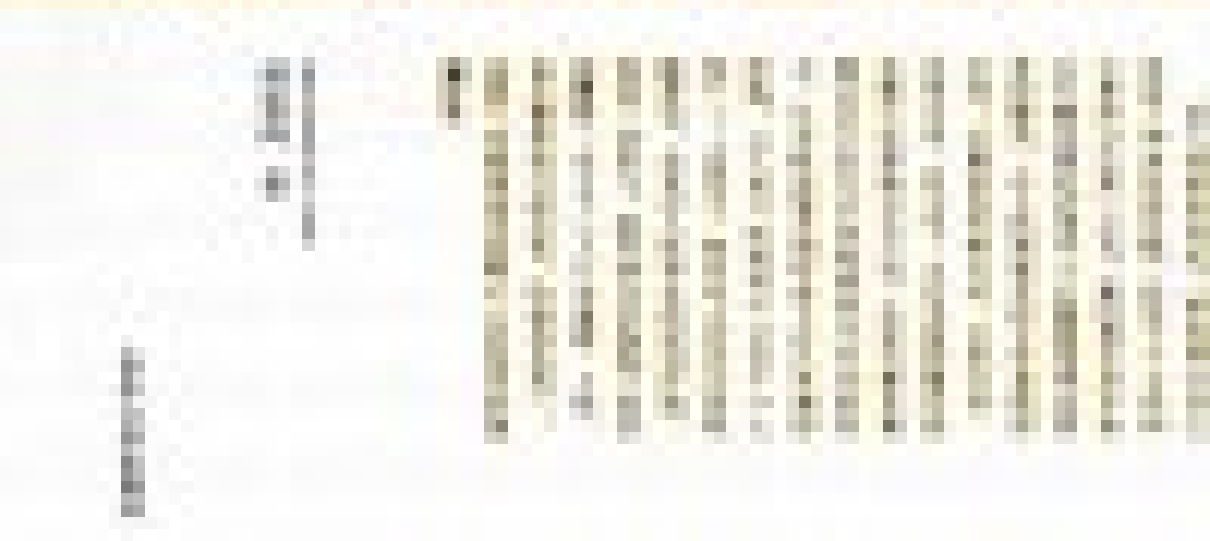
XIN SHI QI XIAO SHUO REN XING FA JUE LI CHENG



进入到新的世纪，新时期文学已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经历了十七年和文革的「严寒」之后，新时期文学开始在乍暖还寒的语境中小心翼翼地伸出探索的脚步，在人性领域寻找文学表现的空间。从最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变革文学、性文学、文化寻根到随后的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作家们都在做着让自己的文字表现得更为自由的努力。从为政治服务到听命于自己灵魂的呼唤，从人的「阶级性」让位于「人性」……这其中，既有人性存在的积极肯定，也有对人性异化的深刻忏悔。而这一切努力，最终使文学挣脱了政治的羁绊，走上了「人」学道路。人性，也从最初的与政治性、阶级性的统一，走到「赤橙黄绿青蓝紫」五彩缤纷的斑斓世界。

HAO CHUN TAO ZHU
郝春涛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新时期小说 人性发掘历程

XIN SHI QI XIAO SHUO REN XING FA JUE LI CHENG

郝春涛 著
HAO CHUN TAO ZHU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小说人性发掘历程/郝春涛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209-05671-7

I. ①新… II. ①郝… III. ①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1717 号

责任编辑: 张 丽

装帧设计: 彭 路

新时期小说人性发掘历程

郝春涛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装

规 格 16 开(169mm×239mm)

印 张 15.75

字 数 18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5671-7

定 价 3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电话: (0531)82079112

抚不平的折皱(代序)

王祥夫

我在湖边那个学校当教员十年,除了游泳,基本上是教三门课:《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写作通论》。当代文学我可以说是熟悉的,教过三个版本,都是大专院校的当代文学教材,拿来教就是,有许多观点一边教我一边在心里不同意,但我还得继续教,因为学生考试不可能是由你出题。

春涛的这本专著可以说是一本当代文学新时期的小说史略,主要是谈小说。当代文学的小说创作真正摆脱了政治阴影是新时期以来的事,当然不可能完全摆脱,但是作家们相比建国初期和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有了极大的自由。春涛的专著集中研究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其目光是敏锐的。说到人性,我认为人性是文学的最终归宿。我们当然知道文学不是“政治学”也不是“经济学”更不是“时事讲座”,但文学又不能完全把这些东西撇清,文学是综合的,但最终应该是人性的,可以说,文学是入学。人是世上最最复杂的存在,外在的,张扬给人们看的,可以不是他的本性,就像新时期的小说一样,种种花样玩儿尽,最终要归到人性上来,春涛的这本专著就是要我们通过外在的、沉潜的或张扬的、柴米油盐的或琴棋书画的表层,看到它的本质。

这是一本专门论述当代文学新时期小说的专著。我在国外,在异域的孔子学院,在异域的大学图书馆,和国外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们一边吃小面包喝

矿泉水一边座谈,他们感到最最困难的事就是他们的研究很难和中国文学的发展同步,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尺度因为翻译问题或其他种种问题总是跟不上中文学的发展。谈到中国当代文学,情况更是如此。他们现在大谈的还是沈从文、巴金、鲁迅。所以说,春涛的这本专著对分析和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和有兴趣于此的读者是有相当裨益的。

真正的文学作品从来都是以其深刻的人性分析影响着世人。而我们当代文学也包括新时期文学作品的人性往往是扭曲的,这就是我们的文学作品为什么很难在更加广大的领域产生深刻影响的原因所在。人种可以不同,地域可以不同,政治可以不同,经济情况可以不同,风俗习惯可以不同,但人性是相通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读《包法利夫人》感动的原因,也是我们为什么读《伤心咖啡馆之歌》感动的原因,也是我们读了情绪大师雷蒙德卡佛的诸多短篇小说为之感动的原因。春涛的这本专著线条是明晰的,那就是顺着“人性”这两个字去研究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性恶、性善、阶级性、男性、女性,种种喧哗嘈杂在一起,世事复杂如此,新时期文学也复杂如此。我读春涛的这本专著,是在给我自己上一堂课。读这本书的好处像是让你坐上了飞机,从高空之上俯瞰大地,下边的河流山脉不再让人莫辨东西,新时期小说创作之河流的走向,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山川形势,都能让人清清楚楚地看到。这是这本书的好处,对一般读者,对学子,乃至对作家。

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的小说现在已经成为历史陈迹,读春涛的这本书其实也是在读史。我希望春涛以评论家的敏锐指出中国当代小说的不足,尤其是这个世纪的小说,中国现在的小说产量之大几如江河滚滚滔滔,但我希望自己能够迟早看到可以被全人类接受并让不同地域的读者感动的作品问世。我希望春涛的研究能继续下去,从上个世纪延伸到这个世纪,这个世纪的前

十年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我们应该怎么样抚平中国当代小说令人不满的折皱？中国的作家，将拿什么奉献给世界文学宝库？

所以，读春涛的这本专著也许是最好的反思，对读者也许不是如此，但对作家却必定是如此。

是为序。

2011年4月

目录 / contents

抚不平的折皱(代序)	王祥夫 1
第一章 人性,自然与社会属性的“杂交”	1
第一节 古代先哲人性说	2
第二节 西方文论人性说	3
第二章 十七年:人性的贬抑与阶级性的强势	8
第一节 情爱:革命者的对抗性修辞	10
第二节 女性:无性别意义的男性陪衬	16
第三节 斗争:无“肉体”的精神较量	19
第四节 劳动,情爱的集体性言说	22
第五节 亲情:阶级性的负面筹码	28
第六节 仇恨:纯化的阶级对立	31
第三章 政治理性剥离与纯真人性张扬	37
第一节 舔舐伤痕与亲情忏悔	38
第二节 个体生存与“人”的价值	47

第三节	蹒跚起步的艰难爱情	58
第四节	原欲冲动与性的展示	79
第五节	艰难友情与惺惺相惜	91
第六节	淋漓复仇与善待宽宥	99
第七节	苦难意识与挫折之感	100
第八节	坚强意志与超常韧性	106
第四章	率真自我独行与原始野性燃烧	132
第一节	心灵和谐与精神自由	132
第二节	原始野性与率性而为	137
第三节	原欲性爱与欲望狂欢	140
第五章	“生存”困境缠绕与荒诞虚无上升	170
第一节	存在荒诞与孤独虚无	170
第二节	精神失落与茫然无措	176
第三节	无尽烦恼与膨胀欲望	179
第六章	人性本恶弥漫与内心丑陋揭示	211
第一节	内心丑陋与动机卑下	212
第二节	暴力倾向与仇恨恐怖	217
第三节	冷漠麻木与情感零度	235

第一章

人性,自然与社会属性的“杂交”

新时期文学是在经历了十七年和“文革”的“严寒”之后,才开始在乍暖还寒的语境中小心翼翼地伸出探索的脚步、在人性领域寻找文学表现的空间的。从最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变革文学、性文学、文化寻根到随后的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作家们都在做着让自己的文字表现得更为自由的努力。从为政治服务到听命于自己灵魂的呼唤,从人的“阶级性”让位于“人性”……这其中,既有对人性存在的积极肯定,也有对人性异化的深刻忏悔。而这一切努力,最终使文学挣脱了政治的羁绊,走上了“人”学道路。人性,也从最初的与政治性、阶级性的统一,走到“赤橙黄绿青蓝紫”五彩缤纷的斑斓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性对于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们来讲是陌生的,没有人能给人性一个独立的、明确的、负责任的概念,因为人性被把持在政治的手中,是政治的附庸或工具。这就使得人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创作的黑洞。人性、人道主义是作家的禁区,也是中国文学的重大缺失。

但这并不是说人性在整个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中完全消失,即使在最严寒的季节,人性也以朦胧的形式出现在作家的视野,哪怕这种初级关怀是完全不自觉的和备受压制的。被政治化、经济化或欲望化、感性化的人性,先是以曲折的形式,最终以独立的姿态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试图从人性的构成、十七年到“文革”期间人性的缺失和人性在新时期文学中的逐渐复苏几个维度,回顾梳理一下新时期文学人性复苏所走过的艰难历程。

在开始之前,有必要先界定一下人性的内涵和外延。

第一节 古代先哲人性说

关于人性,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大多从社会伦理的角度进行阐发。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性善说。孔子未给人性作明确的定义,但其哲学背景在于承认“人性本善”,即人生来就具有一定的“善端”或“善质”,人性的发展,乃是这种潜在特性的“扩而充之”。因此有“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之说。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他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寻找人性的依据,认为人性是人先天就有的伦理道德意识及价值判断能力,是人的社会属性。

二、性恶说。荀子从人的自然属性向社会属性转化的角度剖析人性,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人性的动态转换过程以及人性可以通过外在环境条件和内在主观努力得以再塑的思想。他认为,人性中有“犯分乱理”、“偏险悖乱”的本能,若顺从不加节制,就会出现恶的结果。荀子指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嫉)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这些表明,只要以“礼义之道”约束人的行为,社会就会“归于治”。

三、无所谓善恶说。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即近朱

者赤、近墨者黑之意,人本性无所谓好,也无所谓不好,就像滔滔不绝的“湍水”一样,后天环境起决定性作用。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墨子,他认为:“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同样是人性观的“白板说”。

第二节 西方文论人性说

西方关于善恶的分析大致也可分为三类,这与我国先哲有异曲同工之处。

一、性恶说。对西方有着深远影响的基督教认为,人受到蛇的引诱和“原罪”的驱使,最终被赶出伊甸园,人性中有着如“潘多拉盒子”中释放出的众多负面因素,人只有压抑自己的“原罪”才有可能接近上帝。20世纪杰出的分析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从人类潜意识的角度,对人进行了新的发掘。他认为,人的心理是由三个层面组成的:本我、自我、超我。本我中蕴藏着兽性的冲动,在本质上与动物无异,它遵从的是“快乐原则”。自我“是本我的那么一部分,即通过前意识知觉——意识的媒介已被外部世界的直接影响所改变的那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表面分化(surface differentiation)的一种扩展。再者,自我有一种把外界的影响施加给本我的倾向,并努力用现实原则代替本我中占主导地位的快乐原则”。超我则是“你应该如此如此”和“你绝不能如此如此”之类的“禁令”,它“代表的反对那些选择的一种能量反作用(reaction formation)”,遵守的是“理想原则”。人只有用超我和自我压制本我冲动——即“俄狄浦斯情结”,才有可能为社会所接受^[1]。

另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洛姆认为:“恶是一种人所特有的现象,恶是人回归到前个性状态的,并消除人所特有的理性、爱情和自由的企图。不过,恶不仅是一种人性,而且也是一种悲剧性。即使人回归到他

所体验的最原始的形式,他也决不可能不是一个人,因此,他也绝不能只满足于把恶作为解脱。动物不可能是恶的,动物主要根据它的适合于其生存利益的天生的本能而行动……恶是深刻的人性,因为人不可能成为动物,正如人不可能成为‘上帝’一样。恶是人在逃避他的人道重负的悲剧性的企图中去失去自己”^[2]。这种说法与弗洛伊德的观点十分接近。

二、性善说。以罗杰斯为代表,认为人生下来就有美好的潜质。文艺复兴时期,人性被看做感性、欲望、理性、自由、平等、博爱,并作为人的本质存在、天然权利等,以此反对封建制度对个性的束缚。莎士比亚在他的《哈姆莱特》中对“人”有著名的论断,认为“人是多么高贵的动物”,是“万物的精华,宇宙的灵长”。同时期的薄迦丘则以人性作为反对“神性”的一面大旗,“薄迦丘在使用它(人性)时,往往以赞赏的态度,描述教会的和世俗的男女偷情,把两性关系作为享受现实幸福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内涵”^[3]。

三、性无善恶论。以17世纪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洛克的“白板说”为代表。新精神分析学说的代表人物艾里克森属于性无善恶论,他特别强调自我的作用,认为它能够把人内部发展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引导人性向合理方向发展。

概而言之,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它具有非生物性、非物质性和非时空性的特点。人性首先体现在七情六欲上。何谓七情六欲呢?《礼记·礼运》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这是七情;《吕氏春秋·贵生》说:“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者。”汉高诱注:“六欲,生、死、耳、目、口、鼻也。”在《吕氏春秋·情欲》中有具体的表征,说:“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这是六欲,是各种感觉器官感觉到的外界事物和内部需求。

人性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就其自然属性而言,是趋于本能的,其外在表现为简单的“七情六欲”,从人的本性所蕴涵的动物性讲,人性是趋“恶”的,人的本能使其下意识或无意识地表现为“为所欲为”。在哲学发展的童年时期,人们往往把人的这种自然属性看成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是人的本质性规定。但同时,人又是社会的,具有社会属性。人的“情”和“欲”总是在不同的场合被不同程度地贬抑着。佛家的因果报应,老庄的清静无为,儒家的“克己复礼”,都是在抑制人的本性。儒家学说以人的道德性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规定,这种从社会学角度所做的类属划分,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也描摹出了人作为社会存在所必须遵从的社会规范。今人则认识到“人的根本就是人”,用人的实践、人的生活来说明和看待人的本质,这都标志着人们对于人性问题的认识上的变化与进步。马斯洛认为,驱使人类的是若干始终不变的、遗传的、本能的需要,这些需求是心理的,而不仅仅是生理的,它们是人类真正内在的本质,但“它们都很脆弱,很容易被扭曲,并经常被不正确的学习、习惯及传统的东西所征服。它们是人类天性中固有的东西,文化不能扼杀它们,只能限制它们”。这种被“文化”所限制的人性于是表现出极大的复杂性。“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史无前例的、非再生性基因模式的载体,人类的本性是复杂多样的,这就如同他们的人生观一样”^[4]。叔本华说:“在每个人的内心都藏有一头野兽,只等待机会去咆哮狂怒,想把痛苦加在别人身上,或者说,如果说别人对他有所妨碍的话,还要杀害别人。一切战争和战斗欲望,都是由此而来。如果要减轻这种趋势并在某种程度以内对它加以控制的话,便要充分运用智慧。如果高兴的话,可以称此为人性恶”^[5]。尼采认识到人类天性中的魔鬼,就是人身上的阴暗部分,而且他十分正确地指出这种阴暗性的不可避免:“一点也不错,最使我们难堪的是,这个魔鬼拟人化成我们人格中最卑劣的、最微不足道的、最下贱的一部分”^[6]。由此可

见,人的本性中是善、恶均存的,只有用“文化”、理性来约束,才能使人“从善”。

善恶的界限所规定的价值生活并不体现在每个人完全相同的行为方式上,即是说,就在同一的社会价值观念面前,依然会表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这就意味着人及其行为有着不可预测性、非齐一性、不固定性、未完成性,以及价值上的不确定性。这是人性的易变性特点。这种易变性可以表现在不同的人身上,也可以表现在同一个人不同的经验范围中。

休谟在《人性论》和《人类理解研究》中,就人性问题作了详细而深刻的阐述。在其哲学探索中,休谟始终坚持以“人”为主题并极力追溯一切问题的人性根源。休谟认为,作为人必须具备“理性”、“社会性”和“活动性”这三个特征。但他又从因果联系原理出发,贬低理性的作用而强调感性的作用。他说:“关于实际事情的一切理论,似乎都建立在因果关系上”^[7]。认为经验是认识的源泉和推理的基础,主张以情感、习惯等解释人的行为方式和精神世界。休谟“以自然原则反对形而上学的思辨,把一切超验的尝试拉回到经验的洼地;以人性原则与理性主义抗衡,用人的自然本性取代传统理性的地位;以自然原则作为经验和人性的基础,把经验主义和人本主义归结为自然主义,这是休谟怀疑主义的基本思路,也是他的整个哲学的基本思路”^[8]。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劳动,而“人的劳动创造活动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最基本的活动,它是人类历史的基础和前提,而它自身又以人的需要作为内在原因和根据。离开人的需要,人的劳动创造活动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而也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人类历史的发展”^[9]。人的需要包括人的生命活动所必需的物质资料,也包括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由此形成包括人的社会属性、精神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完整的人性。

应该说,人性本身是善恶、美丑、真假的统一体,对立存在。只有哪个成分

比重占多占少的问题,没有全真善美、全假恶丑的人性。在文学作品中,即使人性得到肯定和传达,也往往是被提纯了的,是被作为局部表达的。E. 弗洛姆说:“人被两种不同类型的激情和冲动所驱使:一种是与生俱来的、人人相同的生理需要,包括为求生存而必不可少的条件,满足饥渴、寻求保护,一定的社会结构、性的满足等等(最后一项需要在程度上低得多)。第二种激情和冲动并不来自生理需要,在不同的人之间也有很大差别,它们包括爱、欢愉、联合、嫉妒、仇恨、竞争、贪婪等等。它们来源于不同的社会机构”^[10]。本文无意就人性起源中的善恶作具体的分析,仅将从生存的需要、性的满足、爱和欢愉以及人性中的恶的成分如仇恨、暴力、冷漠等,对新时期以来至二十世纪末的小说中人性的表现作一个简单的梳理。

参考文献

- [1]弗洛伊德著、杨韶刚等译:《弗洛伊德心理哲学》,九州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 页、第 25 页。
- [2]埃里希·弗洛姆著、范瑞平等译:《人心——人的善恶天性》,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42 页。
- [3]陈应祥等著:《外国文学》,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75 页。
- [4]成明等译:《马斯洛人本哲学》,九州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 页、第 82 页。
- [5]李成铭等译:《叔本华人生哲学》,九州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7 页。
- [6]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191 页。
- [7]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 [8]李淑丽:《休谟人性探究的基本原则》,见《长春大学学报》1999 年第 4 期。
- [9]戴景平:《人的需要:马克思人性论的逻辑起点》,见《长白学刊》2007 年第 2 期。
- [10]E. 弗洛姆:《生命之爱》,工人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5 页。

第二章

十七年：人性的贬抑与阶级性的强势

解放初期，新政权的建立使文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一大批“旧文人”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洗礼。由于受到当时文艺政策的影响，文学被功能化，宏大叙事成为文学表现的主流。出于图解政治的需要，作家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配合当时的现实斗争，强化自己的政治意识，这使他们的作品浸染了深重的说教意味。写作“赶任务”，描述“写中心”，表现“尖端题材”，这些外在的束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作家的个性。就创作现实而言，先验的思想、主题决定了人物的性格、形象、行为，甚至人物的外貌都是固定的脸谱，由此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泛滥。“起于民间，终于庙堂”的文学成了政治的附庸，它不仅堂而皇之地走入人们的生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现实主义文学”本应秉持的批判意味失去了，形而上的思考也被拒之门外。“中间人物”的非阶级特性遭到嘲笑。非难人情、人性的普遍潮流，使作家不敢正视人性、表现人性，把触角伸入到人的心灵深处，也无法按照人物命运的线索，根据人物的性格去表现主题。题材内容、人物形象、创作方法、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的雷同，大大削弱了文学所应有的力量。如寒风的《尹青春》中的尹青春“每一想到自己、怜恤自己的时候，就立刻觉得软弱起来，再没力量支持。而一想到革命和党的事业，就觉得强硬起来，腿上也增加了无穷的力量”，这可说是当时许多人物塑造所乐于选取的方式。周扬在评价此人物时说：“当一个战士单单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保卫自己的一块土地而英勇战斗的时候，当一个农民单单为了发家致富而积极生产的时候，那么，还不能说他是新的人物。只有